

走出『模仿型发展』：应用型高校的学术自主与身份重构

□刘庆斌

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以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优秀为目标,支持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所谓“双优”,指的正是这两个“优”,一头是学校自身的办学能力,一头是其对区域的实际贡献。政策的用意很清楚,应用型不是低一等的层次,而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在“双优”建设道路上,有个问题始终未被解决——不少应用型高校嘴上说的是应用型,手上做的却是研究型。

这并非新近才有的现象。自上世纪末大批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起,办学定位的向上模仿就一直在发生。20多年来,一轮又一轮的转型试点、示范建设推动着这些学校向应用型靠拢,但翻开许多学校的年度总结,摆在最前面的成绩依然是新增了几个硕士点、发表了多少篇高水平论文、有几个学科进入了排名,而校企合作、技术服务、毕业生本地就业这些本该是看家本领的事项,往往排在后面。模仿之所以顽固,恰恰说明它不是一时的糊涂,而是有深层机制在支撑。

把责任归咎于办学者定力不足,并不公平。应用型高校追逐研究型指标,根源在于学术话语权和资源分配的现行机制。学位点审批、学科评估、人才计划、科研项目,几乎所有能带来经费、声誉和政策红利的通道,都以论文、纵向课题、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为主要尺度。一所学校若不在这些指标上用力,就意味着在资源竞争中主动出局。应用型高校的身份焦虑,本质上是被边缘化的焦虑。它们并非不想做应用型,而是担心做了应用型之后,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失去发言权和资源份额。这种焦虑越深,模仿越像是唯一安全的选择。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劝应用型高校安于本分,而在于重新回答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应用型高校的学术性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础研究才是高深学问,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只是对既有知识的运用,属于“二等学问”。这种看法在观念上贬低了应用型高校,也在制度上把它们排在了学术金字塔的底部。事实上,把一项原理转化为可用的工艺,把实验室成果放大到生产线,为一个县域产业集群解决共性技术难题,其中包含的知识创造并不比写一篇理论文章少,只是形态不同、检验标准不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之所以能够与综合大学并立而拥有底气,正是因为整个社会承认应用研究是一种独立的知识类型,而不是理论研究的附属品。我国应用型高校要建立学术自信,第一步就是摆脱“二等学问”的自我暗示,理直气壮地把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当作自己的学术主业。

观念之外,还需要有支撑这种学术性的实际能力,否则自信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其中,师资队伍建设格外重要。“双师型”不能停留在证书和比例上,真正的双师是既能讲课又能解决企业真问题的人,其标志不是有工程师职称,而是有企业愿意把关键项目交给他。眼下的难处在于,教师做横向课题、跑企业车间,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不比写论文少,换来的却往往是评职称时的吃亏,因为技术开发成果无法折算成核心期刊论文。要扭转这一点,学校需要为技术开发型教师开设独立的评价通道,把专利转化、技术标准、企业解决方案放到与论文平等的位置上,把企业实践经历纳入引进和考核的硬条件;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也应承担更多,以产业教授、技术总监等身份为教师的实践成果提供社会承认。学术尊严不是靠文件给的,而是靠一整套评价与激励机制慢慢“养”出来的。

与之相配的,是科研方向的选择。应用型高校不必与研究型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赛道上正面竞争,而应在解决区域产业实际问题上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浙江块状经济发达,一个县往往就有一条相对完整的特色产业链,从传统的纺织、五金、化纤,到新兴的低空经济、储能、智能装备,处处都是真问题。一所学校若能在三五个本地产业领域做到企业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它,学术地位便无须靠论文数量来证明。产教融合也应由此深化,从签协议、挂牌子走向共命运,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成为学校的科研选题来源,让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产业的公共技术中心。

除高校自身的努力外,学术自主的另一半掌握在制度设计者手中。“双优”建设能否真正立住,取决于这两个“优”由谁来定义、用什么尺子来量。如果遴选仍主要看纵向课题、高被引论文、博士学位教师比例,那么它释放的信号就是应用型不过是研究型的初级阶段,模仿只会被再一次强化;反之,若评价真正转向毕业生本地就业质量、专业与主导产业的匹配度、横向技术服务与实际成效,办学者的注意力才会被引向应当去的地方。尺度一变,模仿的底层逻辑才会随之松动。

应用型高校的身份重构,归根到底是一个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过程。当它们不再用研究型高校的标准衡量自己,而是以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赢得社会承认,办学尊严自然随之而来。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专家视点

高校社会实践如何常做常青

□本报记者 汪 恒

秋季学期开学,各高校陆续进入了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结评比阶段。在社会实践这个大课堂里,为什么有的项目能年复一年持续沉淀下来,在学生心中葆有吸引力?以这些项目为鉴,我们能获得哪些机制设计、育人落点和持续发展上的启发与思考?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走访省内多所高校,进行了一番了解。

在“看不见的地方”投入努力

只带50元启动资金,在陌生的城市里生存15天……浙江师范大学的“生存训练”实践项目已连续开展27年。今年夏天,学校团委教师赵雨辰作为带队教师,和28名学生一起奔赴上海,踏上该项目今年的实践征程。

这样的实践离不开多年活动运作沉淀下来的经验:《实践活动提示单》《安全管理手册》等规范文件就有近1万字,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据可查。为保障成员外出安全,团队设有每两小时一次的动态位置汇报机制;每天写下的生存日记,也是教师了解成员心理状态的一个窗口;所有常见应急药品随组配备,提前明确就近医疗机构及就医路线,确保突发状况响应及时。

嘉兴大学“益满湘西”爱心团队的暑期教育帮扶实践到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纺织工程专业学生娄恬恬曾3次参加活动,“系统化”是她对项目最深的感触。团队每年9月纳新后,就会对成员开展为期一年的课堂教学、活动策划等各方面的培训,平时还会组织大家在嘉兴各社区参加“银河双减补习班”项目,锻炼授课能力。奔赴湘西前两周,团队还会集中组织体能训练、教学试讲,并做好物资准备。“这些环节都是一点点总结出来的,比

如我们在湘西会到学生家中家访,当地山路比较多,体能训练就是为此准备的。”娄恬恬告诉记者。

作为指导教师,温州医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陈小英见证了“星途同行实践团”12年来的成长。关爱与陪伴孤独症群体是团队实践的主要内容。“从第一年开始,打磨课程就是重中之重。先由专家明确孤独症儿童、青年需要哪些课程,然后团队再去设计,完成后再次请专家把关。一年年做下来,课程内容也越来越契合需求。”陈小英介绍。团队还为参加活动的孤独症人士设计了成长手册、纪念手册和可视化课表,方便家长记录、追踪他们的成长轨迹。

甘愿“自讨苦吃”的背后是有意义

没有空调、睡觉要打地铺,洗澡也不方便,湘西村镇的这些条件都没有让嘉兴大学“益满湘西”爱心团队的成员们退却。每年暑期,他们都会去待上15~20天。在学校团委书记张婧嫻看来,“在学生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他们是会全身心地去投入的”。

比如,早些年团队成员去家访,发现一些家长觉得读书没什么用,甚至让孩子辍学去打工。大家一方面耐心说服,另一方面努力给当地拉来各类捐助。多年下来,当地学校的图书馆、操场都得到了修缮,专门的奖学金也设立起来。甚至当地还有接受过支教的孩子通过高考,考取了嘉兴大学,并加入了“益满湘西”爱心团队。“大家都希望将这份爱心延续下去。”张婧嫻表示。

温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商企厦”实践队今年恰逢成立20周年。每年的活动环节之一是让学生回到原籍地,去当地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拜访当地企业家。其间,遭到拒绝、对方配合程度不高等情况时常发生。担

任指导教师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余向前在为学生开具证明信函的同时,也会提前给他们打好“预防针”,提醒他们调整好心态。“给学生太容易的东西,就像总吃豆腐,牙齿没法坚硬。只有给一些硬的食物,他才能悟出来该怎么克服。”余向前说,有学生就在借助亲戚朋友联系企业这一常规渠道之外,尝试自己想办法联系企业家,并逐步取得对方信任。

在陈小英眼中,学生与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建立联系,也是一个“看见自己,看见别人”的过程。学生在陪伴、授课的过程中,会细致观察孩子的行为表现及养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反馈给家长。这些反馈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而对医学生来说,能在10多天里作为‘影子老师’全身心照顾一名特殊儿童,并走进他背后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康复困境,这也是涵养医德的重要载体。”陈小英告诉记者。

今年7月,作为“生存训练”实践项目曾经的成员,浙师大设计与创意学院学术副院长王陈辉在与今年的成员聊起参加活动的感受时,依然动情,“‘生存训练’不仅教会了我如何在陌生环境中独立面对挑战,更塑造了我面对人生的态度”。第一次在街头卖报时的勇气、为节省经费而选择步行的坚毅,都成了王陈辉难忘的成长记忆。赵雨辰表示:“这个项目能吸引不同年代的学生积极参与,在于它确实能让参与者得到锻炼,并能切实引发学生在创新创业、劳动实践、团队协作等多方面的思考。”

让初心向深处生长

宁波财经学院“数智赋能乡村”社会实践团,最初源于指导教师、学校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张育斌4年前的一个念头。彼时,聚焦农业智能监

测系统的他想到,要让学生真正了解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设备有没有用,只有去田间多看多试。

前3年,实践团聚焦设备推广与安装。走访中,大家发现设备的管护同样值得关注,便将今年的核心攻坚项目定为“田间智能设备遗失问题专项调研”。“很多问题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发现之后就有了转化的可能,有的需要技术攻关,有的则需要制度对策。”在张育斌看来,实践越深入,可拓展的地方就越多。如今,实践团集聚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大家发挥各自所长,有的写材料,有的拍视频,有的做软件开发,有的做硬件调试。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扬绿水青山 绘金角银边”实践团连续6年深入杭州多地,开展全民健身场地调研。项目源于指导教师陈程读研求学时的研究课题。到浙水院工作后,他在杭州市体育局的指导下,把这一课题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方向。陈程将热爱体育锻炼的学生聚集起来,带大家了解普通民众怎样参与体育锻炼,身体力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设施配置更加合理。

温医大“星途同行实践团”初期聚焦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融合,后来发现,早年参加活动的儿童逐渐步入青年,仍有陪伴需求,便开辟出“青年职业训练营”板块,为他们开展非遗等技艺的实训,在真实的手工劳作中提升职业技能与社会适应能力。而绍兴职业技术学院的“范小蠹”志愿服务团,在19年的发展中,也从最初的课业辅导,扩展到心理陪伴、美育活动,并延伸出电商助农、社情调查等特色活动。“从孩子到村干部,都对学生很认可,学生们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团队指导教师徐钱胤表示。



第一课 逛市场

新学期,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2026级新生陆续奔赴义乌报到。其间,新生们在学长的导览下,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先行感受“世界小商品之都”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龔喜燕 何晓峰 摄)

浙江万里学院：一个社团传承国韵廿余年

□本报通讯员 施冰洁 张卓楠

“要学那鸿鹄折翅犹犹飞腾,指望你奋发读书苦用心……”近日,浙江万里学院小百花戏曲社把大型古装越剧《花中君子》搬上了学校舞台。这部剧从表演到舞美,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这是小百花戏曲社向越剧诞生120周年的致敬演出,也是献给“戏曲之恣”的一次告白。

小百花戏曲社成立于2004年,是万里学院唯一的五星级社团。先后有400余名学生加入,学习的戏曲种类包括越剧、黄梅戏、京剧、甬剧等,其中学习越剧的学生超过80%。22年来,青年学子主动走近、参与、传播,以青春之力守护古老文脉,并打破语言与文化隔阂,让中国戏曲山海“远航”。

学生金可凡2024年加入戏曲社,在《花中君子》中饰演主角陈三

两。接到通知时,距离正式上演已不到两个月。“演这场戏,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要完整展现一个社团积聚22年的精气神。”金可凡最后卸下压力,自信地站在了舞台中央。

2020届毕业生陈乾坤作为曾经的社长,听说要排练《花中君子》,提出主动加入。2009届毕业生胡彦华现任宁波市镇海区海韵艺术团副团长。戏曲社排练中遇到困难,他总是尽力帮忙解决,“是戏曲社让我的爱好成了工作,为大家服务我义不容辞”。

外语学院教师、鄞州区文化特派员刘丽苑负责社团已近5年,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她比谁都清楚。“经费紧张、没有合适的场地和设备,我们就在学校走廊上排练。有时候一个排练厅里,我们排练戏曲,边上在跳现代舞。有的学生既要排练,还要兼顾社团工作和学习。”

出于对戏曲文化的热爱,这群年

轻人不遗余力地奔走传播着。数年间,他们走进养老院、社区、商超、图书馆,开展公益演出近百场,把戏曲的烟火气息送到寻常百姓身边。

2023年年底,戏曲社来到鄞州的养老院,演绎京剧《武家坡》、越剧《十八相送》《追鱼》选段,用婉转的唱腔陪伴老人们跨年迎新;今年4月,宁波市大学生社团节,戏曲社亮相宁波植物园,带来越剧《五女拜寿·奉汤》《相思树·侍郎归》,收获游客阵阵喝彩与掌声。

这群青年还走出浙江,奔赴外地开展戏曲交流。2024年,刘丽苑带领学生来到安徽安庆再芬黄梅公馆,与导演、青年黄梅戏演员共同探寻黄越戏曲融合创新的可行路径。他们播放《陈婆一渡越千年》,将“首南首善”的精神带到安庆;当地演员也现场示范,教学生学唱黄梅戏《打猪草》经典唱段。一来一回的切磋,让两地

戏曲人碰撞出不少关于传统艺术创新的灵感。

这样的跨城文化交流不断延续。2025年,甬剧《宝顺轮》在安庆登台亮相,让安庆观众真切感受到敢闯敢拼的宁波帮精神;今年,戏曲社联合鄞州越剧团带着越剧《常平仓谷事》走进安庆,让王安石治鄞千天、余响千年的故事走得更远。

在刘丽苑的推动下,戏曲社还以留学生为重要传播纽带,探索有温度、可触达的戏曲“出海”新模式,搭建起中外青年对话的文化桥梁。社团吸纳比利时、西班牙、罗马尼亚、俄罗斯等国留学生参与戏曲实践。如在学校外语学院外语戏剧节上,10名留学生参与全中文戏剧《消失的礼物》,演绎唐代诗人李白的趣闻轶事。目前,该剧已被制作成多语种视频,依托学校海外合作平台面向全球展播。